

中国神秘文化名著

巫
子
知

延边大学出版社

PDG

中国
文化经典名著大系
张岱年 石 翔
总主编

中国神秘文化名著

雷 庆 主编 ● 赵永春 张淑英 副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光星
封面设计:尹怀远
版式设计:全明波

中国神秘文化名著
雷庆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学院内)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
字数:501千字 印数:1—2,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34-0789-8/1·64
定价:32.90元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张岱年 石 翔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学术思想空前发展的兴盛局面，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其后二千年来，虽然朝代兴替，世事沧桑，但中华文化却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虽然也曾经过曲折，然而总体趋势却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许多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断涌现和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的屡屡诞生，便是使中华文化卓立于人类文明史的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历史传统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背景下，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华文化思想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思想的渗透和浸润更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思想铸造了国人的灵魂，培育

了民族性格。

《论语》原是儒家先师孔子的一部言行录，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崇；汉代以后，从蒙童的诵读开始，成了读书人的“圣经”；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注释之后，便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论语》的生命力仍然不衰；就是到了现代，《论语》的发行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版再版仍然是惊人的。其中的名句，仍然在印刷品里大量被引用。

何止《论语》如此，在中华文化灿烂的园地里，其它思想体系经过历史的考验与筛选，也各领风骚，连峰叠起。道家学说，至今仍使超然者愉悦；孙子兵法，千秋传诵；佛禅之道，信奉者不乏其众，秦汉之前就已吹响的要求变革的号角，一直或高亢或暗哑地回响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惊了我们这个东方的泱泱大国，把中华文化推向了新的时代，变革思想对民族的觉醒与前进产生了巨大作用……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都在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感召着每一代人奋然前进。

思想文化与民族灵魂、民族性格的关系即然如此密切，自然引发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到底哪些书、哪些思想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最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最能渗入人们灵魂，从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民族性格呢？1923年胡适之撰写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亦撰写了《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等等。这些书目，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

参考。《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也是为对此有兴趣的学人比较集中地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意见。

延边大学出版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从塑造民族灵魂与性格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名著中，将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著作或全录或选其要按儒、道、佛、兵、法和神秘文化、性文化、帝王文化、处世文化、革新文化十大类别，集中编纂，加以作者简介、注释与简析，呈现给广大读者。这样分类，当然只是相对的，各卷之间有些交叉是难免的，命题也不一定都那么准确。例如“神秘文化”，近年来此类图书的出版虽然屡见不鲜，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界定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其中一些著作，宣扬迷信等消极层面如何加以分析与剔除，还有待于进一步进行讨论。然而考虑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此类著作在坊间的较大生命力与民间现实生活中的一定影响，在舍与存的选择上，还是以保留为较完整。再如“帝王文化”，本是政治文化之一种，其内容虽然大都是关于封建专制统治者治国御人之道的，然而它们的认识价值与经过分析之后的借鉴作用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如此等等。每卷书之前均有该卷主编撰写的导言，对上述之问题有一定的分析，请读者留意之。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将是人类更加文明的新起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所当然要为此做出新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并分析中华民族灵魂与性格形成的渊源与脉络，对其精华部分发扬光

大，对于束缚我们民族前进的糟粕部分加以批判并摒弃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武装自己，放下包袱，重铸民族魂，再塑民族性格，大踏步地前进，从而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绵亘的山系，其宏富、深邃与复杂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态，随着历史的推衍，自身也经历着一个发生、发展、碰撞、转变的过程。它对国人灵魂的影响与铸造更是复杂而多变的。它与历代统治者强化灌输、学者文人著作的感召与感染、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等等诸多因素有关。《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的编选主旨与方法，包括它所划分的类别、每一类别所选列的名著、对名著的注释与解析等等，当然只能是一种尝试，因为这是一项既有意义又相当困难的工作，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指导与批评。

1995年11月

目 录

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总序

.....	张岱年 石 翔	1
导论	雷 庆	1
《周易》		13
《河图洛书》		143
《尚书·洪范》		149
《山海经》(节选)		155
《六壬》		194
《三命通会》(节选)	万民英	397
《卜筮正宗》(节选)	王洪绪	466
《黄金策》	刘 基	560
《宅经》		595
《葬书》(节选)		610

导 论

雷 庆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哲学文化、艺术文化等，也包括传统的宗教文化与神秘文化。

近些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热一直在持续着，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对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研究也颇有进展，陆续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论文。在对神秘文化的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注意从多角度、全方位对神秘文化的内涵、特点、影响及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的发掘，力求从中发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以此服务于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中国神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有其特定的民族文化渊源和社会基础。一般将中国神秘文化产生的思想渊源具体化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致思方向；二是“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三是“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的思想；四是灵魂不灭的观念。这种说法颇有道理。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思考和解释模式。一般认为，“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是因为古代社会生

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再加上社会的稳定等也受到自然力的强大制约，故人们转而迷信和崇拜“神”或“天”这个难以捉摸的神秘的异己力量，认为只有“神”或“天”才是支配和控制地上人类事务的主宰，由此才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结论，初看起来，似乎没有疑义。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并不全面。

诚然，人最初迷信“神”或“天”确与自己的无能为力有关，但仅仅膜拜“神”或“天”，将其视为支配和控制自己的外在力量，还不能视为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且“神”与“天”，这是两个差异相当大的概念，其内涵不同。如果说迷信“神”还带有比较原始的简单的特点的话，迷信“天”则就不那么简单了，而由此达到“天人合一”的认识，情况就更为复杂了。由“神”到“天”到“天人合一”，代表了先人们认识能力的三个不同的演进阶段，标志着他们思维水平的逐步提高和飞跃。

中国先人较早的崇拜是对祖先的崇拜。此时，祖先与“神”几乎是划等号的。殷人重卜崇祀，“卜”便是求祖先神降命的意思。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指出：“当人类对于自然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时候，必然在意识上寻求安慰，使矛盾在祖宗神上求得解决。祖宗一元神的思想支配了殷人的世界观，这正是早期奴隶制时代父权确立的特征。”殷人的崇祀，从高祖夔以来之祖、示、王、父、土诸字都具有祖先的意义。按祖、示、土诸字，皆像雄性的生殖器。祖先后转为宗教一元神。这一元神的殷世宗教，是殷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因而万事求卜，迷信于祖宗神的降福保佑。同时，宗祖之义从牡器“企”，是家父长父权制确立的标志，而族方之义从牝之“匕”，则留有母权制的遗制。殷末二王称帝，“帝”本指天上的祖宗神。到了文明时代，地上的王也开始称帝，这表示族长的地位具备了超出于社会的个人权力

——公权，它标志着族员之间的阶级分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文明的演进。

周人继承了殷人崇祀先祖的观念，但它已不是像殷人那样只是崇祀皇帝一元神，周人将先祖与上帝分离，同时又相互配合。因此，上帝与天命的思想是周人的建国思想。周产生了敬天、尊上帝、配天命的宗教，这便是上帝与先祖的分离，同时又将二者结成一体，以先祖克配上帝。“天”，在周人的思想中，是“帝”的一种变享。周人的“天命”观，在《诗经》中有许多体现。周人的“天”、“帝”观念，显然比殷前进了一大步。不仅如此，周人还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周人认为，宇宙之上有至上神主宰，曰天，曰皇天，曰皇天王，亦曰帝，曰上帝，曰皇帝，曰皇上帝。上帝能命先王，能赐人以福祐；有威可畏，祸乱自天而降。人受生于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者谓天子。天子与天相配。人民疆土及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周人又继承了祖先神，认为：人死后其灵不灭曰严，其配曰母。父以上曰祖，其配曰妣。远祖谓之高祖，统称之曰前文人。周人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在伦理观念上就延伸为敬德；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在伦理观念上就延伸为宗孝。他们“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其宗教思想和伦理思想实质上都是天人合一的。周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仍然是较原始和粗糙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周人将“天人合一”观念进一步引伸扩展开去，将人与天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与联想，“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终于作八卦，成《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冠”——《周易》的形成，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周人“天人合一”思想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它鲜明地表现了古人对宇宙、社会、人生长期博察精思、抽象归纳、演绎推理、模拟类比的艰苦而伟大的思想求索过程。这里，值得特

殊提出的是《周易》的象数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所谓“天”有三层含义：一是“神化之天”（实际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天”）；二是“义理”之天（伦理化了的“天”）；三是“自然之天”。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古人观念中还有一种“数理之天”。这种“天”的理论，似乎并无人格化的神可寻，又不实用式地谈论道德义理，涉及自然知识而其意不在专门研究某一自然领域。它力图以数理关系，以某种高度抽象化的图式或符号去概括和具体解释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和变化莫测的人生，乃至欲以此说明过去，了解现在，预知未来。《周易》以及《河图》、《洛书》便是这方面的杰作。后来的奇门遁甲、六壬之术、纳甲筮法等大体上也属于这个范畴。古人以数理关系及某种图式或符号去说明世界的愿望似乎是荒诞谬妄、非理性反科学的，但令人惊奇不止而又难以解释的是，其中某些数理原则和图式符号却居然与某些现代科学原理暗合并给予现代科学研究以某些重要的启示，《周易》便是如此。古人既然认为“天人合一”，那么自然也就将人世的一切统统纳入象数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的象数文化。这种象数文化才真正是最为“神秘”、最难思议的“神秘文化”。如果只是简单地将象数归结为生产力极端低下时期中国人蒙昧无知的产物，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倘如此，数千年来为何《周易》研究持续不衰，何以能令那么多睿智的学者去倾心研究？笔者以为，中国传统的象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不能表明中国先人的蒙昧、消极和被动，相反，它恰恰表明先人们不断提高的思维能力，积极的主体意识以及主动认知世界的不懈努力。人们知道，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强大的王朝之一，一切都体现出进取向上的势头，而此时期的神秘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体现了博大恢宏的气势。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此时期神秘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中国古代的五行观念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与其他文明

民族一样，中国的先人很早便开始了思索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的过程。那浩渺的太空，无数的星辰，色彩纷呈的物体，循环往复的四季，以及各种事物的推移变化，这些都不能不引起先民们的研究兴趣。五行观由此而生。

五行观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尚书·洪范》则明确提出五行之说。春秋战国时期，五行观得到发展；至秦汉时，五行观则进而演化成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起源、结构、变化的庞大理论体系。中国远古的思想家们面对变化万千的世界，直观地发现，有五种东西，即金、木、水、火、土于人的关系最为重要。《尚书大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后来，随着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开始总结金、木、水、火、土的性质，并将其联系起来探讨各自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五行说的最早萌芽。《尚书·洪范》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西周末年，著名思想家史伯使五行说有了重大发展，他认为五行相杂可以形成百物，这样，就从具体的物质论发展到了元素论，五行成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而五行学说也便上升为一种宇宙论的思想。秦汉时，出现了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这样，五行便成了一个首尾衔接的生克圆环。这种五行生克理论的确立，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从此，五行生克理论就成为古人把握宇宙构成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基本原理，成为中国神秘文化的理论基石之一。

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邹衍，用五行生克循环往复的关系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更迭，提出“五德终始”论。这种建立

在五行基础上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观，影响巨大。后来，五行又被推广之以解释人伦道理关系。董仲舒认为五行间的授受关系也是父子关系的准则。再其后，五行又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直接联系起来，直接运用于伦理关系。秦汉以后，五行说逐渐被用来解释几乎一切现象和发展，成为各文化领域的理论基础。

五行说尤广泛渗透于中国人的各种神秘文化。如古代相术将人分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水形之人”；纳甲筮法将卦之六爻分别赋以五行属性；星命术更是离不开五行。这种五行说尽管还失于简单和机械，但它体现了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历史上，“五行”说与“阴阳”说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被称为“阴阳五行说”。阴阳说成为《周易》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易传·说卦传》提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也就是说，卦是由观察万物的阴阳两面而形成的。《周易·系辞上》更把阴阳上升到根本大道的地位，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后来，阴阳说又与五行说联系起来，使五行也各自具备了阴阳的特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系统地总结了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从而使阴阳说充满了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种阴阳说，是中国神秘文化的又一重要的理论基石，如中国的风水术，就主要以阴阳观念为指导，故“风水师”又常被人称为“阴阳先生”。

灵魂不灭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较大影响。其中与神秘文化关系尤为密切。中国古代的巫术、鬼神文化、风水术、占梦术都充满人死而有灵的思想观念。既或其他种类的神秘文化，也或多或少地烙有灵魂不灭的思想印记。尽管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儒学不明确宣传鬼神，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它特别重视祭祀先祖，这又无疑助长了人们灵魂不灭、

鬼魂有知的观念。尽管历史上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曾明确地否定鬼神和灵魂不灭之说，但灵魂不灭说和鬼神观仍长期盘踞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并非神秘不可解，它不是无源之水，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反之，假设它在古代未曾出现，倒是不可解之事。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宗教文化（或神秘文化）的产生有相类似之处。但是，与其他国家的神秘文化相比，中国的神秘文化又独具自己的特点。

首先，中国的神秘文化不怎么突出或者不讲人格化的神，尤其不突出某一主宰之神，而是突出天命。故而未能形成一个压倒一切的人格化了的主宰之神。因此之故，终于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有神论的宗教。在中国的神秘文化中，没有基督教中耶和华式的上帝，没有伊斯兰教中安拉式的真主。虽然后来在道教文化中和神话中出现“玉皇大帝”，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绝无耶和华和安拉的权威，更谈不上对他的信仰。他在大多数中国古人的眼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物，甚而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如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便采取了此种态度。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关帝一类的被神化了的人物，但与其说是人们对关羽成“神”后的信崇，勿宁说是对他生前事迹的哀思缅怀和人格崇拜。人格化的“神”，在历来中国人的观念中，似乎始终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时而信其有，时而信其无，并未形成坚定的信念。从儒家的祖师孔子开始，便是如此。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季路问鬼神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鬼神一直采取闪烁其词的回避态度。儒家虽然重祭祀，但似未认定死者亡灵能够感知并享用供品，主要是做给生人看的，为一种礼教形式，正如孔子所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如上坟烧纸钱和春节供家谱之风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多数烧纸上供者便是此种心态，不过是表示尽一点孝道，求得心理平衡而已。儒家的重人事、轻鬼神的传统思想和对鬼神之存在与否含糊不清的态度，对中国神秘文化，对中国的民族心理都有一定影响，多少减轻了鬼神方面的迷信色彩。虽然中国人好谈鬼神，但其中不少人的态度是持“不可不信，不可强信”的模棱两可的态度。相比之下，中国神秘文化主要突出“天命”。“天命”、“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神秘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如前所述，早在周代，天命论就已确立。宗周的孔子完全继承了这种观念。虽然《论语》中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的记载，但实际在《论语》中谈“天”谈“命”之语比比皆是。孔子是相信“天命”的，甚至提出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的论断，在这里，信天知命竟又成了重要的道德标准。问题是，“天”这种冥冥中的宇宙万物之主宰，很类于客观唯心主义中“绝对精神”，其实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数千年来谁也未能说清的问题，也是中国神秘文化中真正神秘之所在，这也可能正是中国神秘文化数千年来绵延不断，一直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其次，中国的神秘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中国传统儒学，与中国的传统道家等文化，乃至与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皆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交融。其中与儒学的联系尤值得注意。上述儒学创始人孔子对“天命”的态度，再加上儒家群经之首同时又为道教所宗的《周易》的影响，这无疑为后世儒者大模大样地介入神秘文化，主要以预知天命为主要内容的术数文化，敞开了大门。这样就无怪乎后世儒学与神秘文化结下了长期不解之缘。历史上有一些大儒，如董仲舒、京房、李淳风、袁天纲、邵雍、刘基等，还是谶纬文化或术数文化的重要制作者。因为儒学和儒者的推波

助澜，神秘文化不仅流传于民间，并活跃于庙堂之上，令不少帝王将相、封建士大夫也倾心此道，甚至使一些文化教养很高的学者着迷。于是，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神秘文化的神秘气氛。因为儒学和儒者的介入，中国的神秘文化有时竟与儒家难以区分，如汉代，儒学化了的神学和神学化了的儒学便是二而一之物。因为儒学和儒者的介入，中国的神秘文化便不能不打上深刻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烙印。

第三，中国的神秘文化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蕴含着其他各方面的诸多知识信息，如天文、历法、数学、哲学、兵学、医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信息。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神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中国神秘文化之积极价值的主要所在。

神秘文化对中国的历史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究竟有多深多广，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首先，神秘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五德终始”的五行说和循环论，在各封建王朝更迭中就曾产生重要影响。在王朝更迭之前，它起着动员反对推翻旧王朝的舆论力量；在王朝更迭之后，它又起着稳定和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东汉王朝和新莽政权交替之际，谶纬文化就曾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王莽有效地利用了这个神秘的武器。至于其他各类神秘文化的影响，也比比皆是，此不赘述。

第二，神秘文化对经济活动也有较大影响。如，古人每逢大事，往往卜而决疑，经济活动也是如此，古代的占筮术中，大多有预测财运、生意等类活动的论述，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神秘文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影响渗透更为明显，对科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对儒学的影响，前面已经涉及。儒学之外，它对哲学、历史学、天文学、文学、医学、建筑学、军事学等都有较大影响。当然，这些文化、学术反过来也